

# 论孔子对司马迁取舍运用上古神话传说的沾溉

张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以补上古史资料的缺失。其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取舍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及《史记》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沾溉。在司马迁对上古神话传说取舍加工的过程中,孔子的天命观、符瑞思想、春秋“取材”及其对神话历史化的贡献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对其脉络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发展演变历程。

**关键词:** 孔子; 司马迁; 《史记》; 上古神话传说; 神话历史化; 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1-0136-05

从《史记》中关于孔子的记载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极为推崇,并以孔子著《春秋》功业的后继者自居。他认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sup>[1](1947)</sup>,堪称“素王”,并将其纳入“世家”,与王侯并驾齐驱。“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sup>[1](3296)</sup>在此,司马迁明确表示要以孔子著史为榜样和创作《史记》的动力之一。在《史记》中司马迁多处引用孔子的言论:《殷本纪·赞》:“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sup>[1](109)</sup>《吴太伯世家·赞》云:“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列传》云:“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sup>[1](2122)</sup>在《礼书》《律书》《封禅书》《河渠书》中,这种引用也随处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上古神话传说以补上古史资料的缺失,并将上古史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其取舍加工上古神话传说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以及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之外<sup>[2]</sup>,也深受孔子的影响。本文拟从孔子的《春秋》“取材”与司马迁神话取舍原则、孔子的天命观与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司马迁对孔子神话历史化的继承与发展、孔子的符瑞思想与司马迁取舍神话的时代风气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 一、孔子《春秋》“取材”与司马迁神话取舍原则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司马迁就有师从古文经大师孔安国和今文经大师董仲舒研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的经历。时代背景及这一特殊经历使得司马迁对儒家经典十分推崇,而且相当熟习,《五帝本纪》即是以《尚书》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姓》为准则取舍史料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道,《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sup>[1](3299)</sup>“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sup>[1](3297)</sup>在此司马迁对六书的主旨及专长进行了深刻阐释。

孔子作为六经删定者和传承人,在儒学独尊之后,成为万众效法的一代宗师,其言论遂成为千古不易的最高法则。《史记》中许多篇章就大量引用孔子言论阐述自己的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sup>[1](3297)</sup>《天官书》载:“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襍祥不法。是

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sup>[1](1343)</sup>由是可见，太史公取舍运用史料是以孔子为榜样，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发议论，继承了孔子删定六经的审慎态度和严谨精神。

在六经之中，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皆认为《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sup>[1](3295)</sup>“仲尼厄陈蔡，作春秋。”<sup>[1](3300)</sup>孔子作《春秋》一事对司马迁影响尤为深远，“夫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sup>[1](3298)</sup>可见此书极为司马迁所推崇。《春秋》的书写方法也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春秋》详今而不写古的做法，对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建构上古史产生了极大影响。陆贾在《新语·术事》中云：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官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sup>[3](41)</sup>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春秋》略古详今的写作原则。《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sup>[1](487)</sup>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孔子详写近世历史的做法十分赞赏，对其序《尚书》时对不可知的上古历史采取简略或缺而不录的态度大加称誉。《孔子世家》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sup>[1](1944)</sup>司马迁对《春秋》寓褒贬于曲折的文学笔法也大为称道，在孔子的笔削与隐喻之中，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不足以表现其对于历史事实的态度，故略而不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sup>[12](2738)</sup>的“实录”精神，以及“至于麟止”<sup>[1](3300)</sup>的时代断限，都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启发。《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sup>[1](488)</sup>对于这种迷惑，司马迁采取“折中于夫子”<sup>[1](1947)</sup>的态度，得出“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sup>[1](488)</sup>的结论，而没有相信谍记的说法。然而，司马迁为了写一部通史，不得不自上古开始，在上古史史料奇缺的情况之下，无法完全做到“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司马迁将两千多年的上古历史简化为少数篇章，只是略及大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

事，稽其兴坏成败之理”<sup>[12](2735)</sup>，其取舍上古神话传说补充上古史史料之不足，是和孔子作《春秋》及序《尚书》的“取材”原则相吻合的。

## 二、孔子的天命观与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

《史记》中的上古神话传说主要是始祖神话。关于始祖神话，张筠认为“《史记》于始祖神话材料的运用涉及了神话与历史关系的三种形态，即神话的历史化，如黄帝；神话化的历史，如简狄、姜嫄、女修等；历史的神话化，如刘邦等。司马迁于刘邦神化材料的处理表现了清醒的历史批判意识。”<sup>[4]</sup>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就受到了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孔子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看作人类和自然的最高主宰。像一切神教信徒一样，孔子对于上帝也充满了虔诚敬畏之情，并把它作为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和精神的寄托。孔子神话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点记载至上神上帝而不言具体神祇。《论语·述而》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sup>[5](480)</sup>这种强烈的反差说明孔子崇信具有高度抽象本质的上帝，而对离奇怪诞、违背常理的具体神祇则避而不谈。孔子思想中的宗教观念与理性精神是相互矛盾的，他对天、天道和天命的观点比较复杂，既有相信天命，认为不能得罪上天而敬畏天命的一面，同时也有敬天命而又远之的一面。《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sup>[5](100)</sup>《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押大人，侮圣人之言。”<sup>[5](611)</sup>《论语·雍也》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sup>[5](236)</sup>《史记·孔子世家》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sup>[1](1941)</sup>这些显示了孔子对天道和性命的敬畏与罕言。孔子观念中的“天”是有多重意义的，有时是指支配一切具有思想意志的上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畏天命”等，《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sup>[5](488)</sup>；有时又指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sup>[5](698)</sup>总之，我们可以说孔子对天的态度是敬仰的，但是出于敬畏的态度所以不轻易言“天命”和“天道”。这种罕言天道鬼神的态度是其既重视天命意志，更重视现实人生的表现。

孔子思想中的宗教观念与理性精神是以矛盾的形

式并存的,这使其在理性精神限制下不能肯定神话的存在,而其理性精神的不彻底又使其不能完全否定神话。于是,孔子只是徘徊于二者之间,对神话存而不论。

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也受孔子天命观的影响,使其在信天命与不信天命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在司马迁看来,具体神祇“其言不雅驯”,和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与理性背离的程度更加遥远,故罕论具体神祇。他在《大宛列传》中明确表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sup>[1](3179)</sup>

司马迁一方面继承了孔子天命观,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天命观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伯夷列传》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佞所谓天道,是邪非邪?<sup>[1](2124-2125)</sup>

这段话体现了司马迁对天命思想的质疑与反思,索隐曰:“太史公惑于不轨而逸乐,公正而遇灾害,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感之也。”自周公始,正式割断了人神之间的血缘纽带,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sup>[6](227)</sup>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怀疑,这是对儒家思想的突破,也体现了司马迁著书要“成一家之言”的批判精神。

武帝即位之后,虽然将儒学推上了独尊的地位,而其个人对神仙思想更为热衷。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的同时,也对武帝求仙做法进行了大胆的否定与批判,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天命观的影响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神话化和仙话都是不切实际的虚幻之说,都是对“怪、力、乱、神”的热衷,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手段,对它的批判恰恰是对孔子重视现实人生和现世社会的继承,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关注现世的精神。

在取舍上古神话传说时,司马迁不言具体神祇,认为“其言不雅驯”,并对刘邦等历史神话化进行了大胆的批判,继承了儒家“天道观”并有所突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马迁笔下的神话传说才走下了神坛,具备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在取舍材料建构上古历史的过程之中,孔子天命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三、司马迁对孔子神话历史化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并肯定神话历史化的思想家,他的这一贡献是非凡的,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神话范围,而涉及到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不仅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拓展了上古中国的历史空间观念,而且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司马迁正是在孔子发现并肯定神话历史化的基础上,取舍加工而成上古史,使得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功不可没。

吕微曾经比较了《吕刑》与《汤诰》《非攻》《楚语》和《山海经》中记录的蚩尤作乱神话,结果表明,成书于商朝初年、早于《吕刑》近千年的、同样讲述蚩尤、三后神话的《汤诰》就已经充分历史化了。这提示我们,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性质可能原本就是汉语神话的“本来面目”之一。<sup>[13]</sup>吕微认为这种神话历史化现象其实远在商代就开始了,并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开创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孔子整理六经,曾经序《尚书》,《汤诰》作为《尚书》一篇,有没有受到孔子历史化思想的改正,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孔子对神话历史化的解释,其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

孔子最先肯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神话演变为历史传说,并对此作了正式记录。《论语·泰伯》记载: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官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sup>[5](107-108)</sup>

孔子在肯定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完全淡化了神话色彩,使尧、舜、禹一变而为人间帝王和仁德谦让的上古圣君。

孔子主张“大一统”,在他所编定的《书经》中建立了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同时对一些传说进行了“历史化”的合理解释。例如,《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也。”<sup>[7]</sup>

“黄帝四面”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sup>[8] (297)</sup>

在此，孔子对“一足”作了历史化的巧妙阐释。《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又云：“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sup>[9] (119)</sup>把黄帝活三百年说成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这些都被司马迁接受，并写进了《史记》之中。

司马迁在接受“神话历史化”的过程中，大抵不离孔子所言，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孔子著述参照，以确定取材的内容。《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云：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sup>[1] (46)</sup>

对取舍上古神话传说采取审慎的态度，“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伯夷列传》首段云：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sup>[1] (2122)</sup>

由此可见，太史公对传说中多有涉及而文献典籍罕载的人物不加选取，而是以孔子多次颂赞的古圣先贤作为主要的选材对象。站在神话学的立场上，孔子和司马迁的神话历史化，是对神话的“忽视”和“歪曲解释”，使得中国上古神话零散甚至亡佚。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反对把超自然内容直接写入历史，的

确是一个严谨、科学的历史观。由于司马迁对孔子神话历史化的继承，使得中国上古史神话和历史杂糅，成为一道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

#### 四、孔子的符瑞思想与《史记》的符瑞记载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对符瑞的看重，朱熹注曰：“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sup>[10] (111)</sup>麟、凤、龟、龙号称“四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亮点。《礼记·礼运》云：“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sup>[6] (1329)</sup>麟为仁兽，主和平、嘉瑞；神龟主寿，龙凤呈祥。麟列“四灵”之首。

《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获麟绝笔”一事：“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sup>[1] (1942)</sup>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论。在司马迁时代，人们对“孔子获麟绝笔”一事则是确信无疑的，认为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泽获麟，此乃圣王之嘉瑞，这是符合当时“天人感应”学说和统治阶级“受天明命”思潮的。当然，这也受到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局限，以及汉儒重师承家法风气的影响。《春秋左传集解》杜预注曰：“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sup>[11] (1796)</sup>孔子认为麒麟被猎获是出非其时，认为是“吾道穷”的符兆，遂不再作《春秋》。他认为麒麟是吉祥之物却被捉，预示着不祥，所以孔子“绝笔”。司马迁以此确立了《史记》创作的下限。时值政治和国家繁荣以至天降麒麟：“郊雍，获一角兽，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肃抵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风符应合于天也’。《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sup>[1] (3300)</sup>《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sup>[1] (3301)</sup>《太史公自序·索隐》引服虔云：“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sup>[1] (3301)</sup>

孔子“获麟绝笔”一事对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产生了直接影响，即是在《史记》中保留了许多符瑞的记载。如《五帝本纪》曰：“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

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sup>[1](43)</sup>《夏本纪》曰:“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sup>[1](81)</sup>“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sup>[1](86)</sup>将符瑞与朝代兴衰联系在一起,这是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所不曾有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继承孔子思想而又对其有所突破,将神话传说进一步历史化,从而使其定格为上古史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经过儒家经典与历代史家的不断继承与强化,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后世虽有新的神话不断产生,但有《史记》中神话传说的影响存在,我们都会潜意识地将之为小说家言,自觉将其与正史区分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太史公取舍上古神话传说的一大贡献。而在这一取舍加工的过程中,孔子的天命观、符瑞思想、春秋“取材”及其对神话历史化的贡献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脉络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发展演变历程。

####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张华. 人神之际多元互动下的“实录”坚守——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的原因探析[J]. 中华文化论坛, 2011(2): 124-131.
- [3] (汉)陆贾撰, 王利器校注. 新语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1.
- [4] 张筠. 从<史记>对始祖神话材料的处理看司马迁的历史观[J]. 中华文化论坛, 2003(1): 80-84.
- [5] (清)刘宝楠撰, 高流水点校.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6]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影印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7] (宋)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卷七十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8] (清)王先慎撰, 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297.
- [9] (清)王聘珍撰, 王文锦点校.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9.
- [10]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1.
- [11]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疏. 春秋左传集解[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12]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3] 吕微. 现代神话学与经今, 古文说尚书吕刑阐释的案例研究[C]//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Confucius' influence on Sima Qian's choice of ancient myths and legends

ZHANG Hua

(Literature Department,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Sima Qian adopted a lot of old myths and legend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hangGuShi materials in *Shi Ji*. His choice of old myths and legends are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cancelation of the backgrou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love”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o the creation principle and effect, but also favored by the purpose of Confucius's thought. In Sima Qian's old myths and legends processing process, Confucius' view of destiny, Fu Rui thought, the spring and autumn “materials” and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The context of it help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evolution course.

**Key Words:** Confucius; Sima Qian; *Shi Ji*; the old myths and legends; myth creator; destiny view

[编辑: 苏慧]